

Jean-Paul Sartre

# 薩特傳



007789

Jean-Paul Sartre

# 薩特傳

高宣揚著 ·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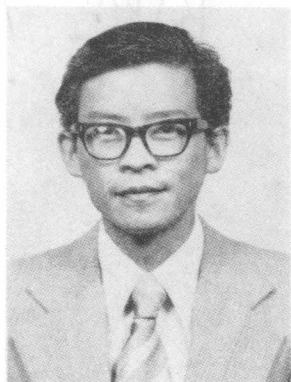
淮阴师院图书馆1245971



責任編輯 張樂珠  
裝幀設計 陸智昌

書 名 薩特傳  
作 者 高宣揚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眾街四十號廿四樓  
版 次 1986年11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140×204mm)296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514·5  
©1986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 作者簡介



高宣揚，一九四〇年出生於一個華僑教師家庭，五十年代初在印尼萬隆讀中學，一九五二年回國，一九五七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六六年獲該系研究生文憑，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為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人文科學叢書》主編。一九七九年底到巴黎第一大學哲學系深造，攻讀現代外國哲學，並於一九八三年獲該校博士學位。一九八三年至今，高氏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所屬“政治、社會及經濟哲學研究組”的研究員，並兼任巴黎第十大學政治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存在主義概說》、《結構主義概說》、《羅素哲學概論》、《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概論》、《羅素傳略》、《佛洛伊德傳》、《畢加索傳》等，以及用法文發表的論文多篇。



## 前 言

首先，有必要簡單地回顧這本《薩特傳》的孕育、準備和創作過程。一九八〇年春，薩特病逝時，我正在巴黎大學準備哲學博士論文。這位傑出的哲學家的突然停止思想，給了我很大的震動。我從那時起，便開始搜集薩特的材料，準備在探索和研究他的著作、思想和歷史的基礎上，為他寫一本傳記——既是我學習的一個總結，又是對這位偉大哲人的紀念。時隔兩年，香港三聯書店經理蕭滋先生，適逢參加西德法蘭克福書展之際，訪問巴黎，約我為三聯書店寫一本介紹薩特一生的傳記讀物，於是，這本《薩特傳》就正式納入了出版計劃之中。這對我無疑是一個最大的鼓舞。因此，我首先要向蕭滋先生及其同事們表示深切的感謝。

和我過去所寫的《羅素傳略》、《佛洛伊德傳》及《畢加索傳》一樣，這本《薩特傳》乃是一種歷史描述和思想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的產物。按照這一方法，當我們為一個歷史人物，特別是為一個思想家立傳的時候，要把重點放在歷史環境和個人思想發展的分析上面。

薩特本人一再強調，貫穿於他的歷史之中的，乃是他所渡過的那個歷史時代的本質性事件和矛盾的縮影。薩特強調：他的歷史起自本世紀初，中經兩次世界大戰，然後一直延伸到六、七十年代那充滿危機的時代。正如薩特自己所說，他是一個追求自由、身負歷史責任感的人。他不能脫離歷史而存在。或者，用薩特的存在主義的語言，他是一個在歷史中“存在的個人”。

因此，這本傳記自始至終都試圖把薩特的活動和思想發展置放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

其次，薩特是一個思想家。他的傳記當然首先應該成爲他的思想發展歷程的一個縮影本。筆者在爲薩特編寫這本傳記時，始終都把薩特的思想發展看作是他的整個生活的精神支柱。正如西蒙·德博娃所說，從她認識薩特的第一天起，她就發現薩特一直不停地在思索着；他的頭腦是一部不知疲倦的、以思索問題爲樂的、生產精神產品的機器。薩特之成爲薩特，首先是由於他的獨創性的思想以及這種思想的永無滿足之日的發展。這本傳記要給讀者提供的，首先就是薩特思想發展過程的圖畫——而這張圖畫，如前所述，永遠都是以一定的歷史環境爲背景的。

再次，薩特是一個作家。很難設想，一個好的薩特傳記能離開對他的作品的分析。薩特曾說：“我是在書堆中開始我的生活的，就像毫無疑問地我也要在書堆中結束我的生命一樣。”他從形成自己的意識以來，就同書打交道；而打從他會寫字開始，他就試圖創作。此後，他的筆從未停息過，就如同他的頭腦從未停止過思維一樣。他的書乃是他的思想的記錄，乃是他的歷史的總結。因此，把握了薩特的書，也就把握薩特的爲人。這就是爲什麼薩特爲自己所寫的自傳性作品《字句》，僅由《閱讀》和《寫作》兩大部份構成——在某種意義上說，薩特的歷史就是看書和寫書的歷史。這本《薩特傳》就正是以薩特寫他自身歷史時的這個指導思想作爲基本指針，向讀者有系統地介紹薩特的著作的歷史背景、基本內容以及它們的歷史作用。薩特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部歷史的百科全書——它是歷史的放大鏡，可以透視現代法國、乃至西方社會歷史的發展足跡，可以瞭望法國、乃至西方現代文學及現代哲學的發展的主要輪廓，可以鑑賞到西方現代文化的豐富產品，也可以分析出其中的糟粕。因此，對薩特作品的分析成了本傳記的主要內容。

薩特的作品又是他戰鬥的記錄和總結。這位哲學家 and 作家一生

酷愛自由，鄙視一切權威——創造、超越和追求真理構成了他的鬥爭動力。他相信自己的存在能力，但也非常熱愛人民大眾。他的心同受壓迫的人是貼在一起的。翻閱薩特的歷史，在我們面前出現的，是一個挺身捍衛人的尊嚴和自由的戰士，是永不安於現狀的真理追求者。

要給薩特作一個公正的評價並不容易。須知，薩特自己也曾說：“我經常自己反對自己。”這不僅因為他有無可爭議的、明顯的缺點和錯誤，而且還因為歷史永遠是在發展中——薩特充其量也只是人類歷史漫長發展中進行暫短的自我表演的一個人物罷了。如果說，薩特那二千多頁的三大卷《家庭中的白痴》都未曾能夠給福樓拜作出一個歷史的判決的話，那末，作為中文寫的第一本《薩特傳》，本書作者也就不奢望在這本小小的傳記裏為薩特作出結論式的評語。筆者相信，讀者將會在進一步閱讀薩特的作品的過程中，經過分析和批判，對薩特作出公正的評價。

## 高宣揚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日

於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閱覽室



## 目 錄

前 言	iii
第一章 母親	1
第二章 外祖父	12
第三章 神童入學	31
第四章 母親改嫁	41
第五章 巴黎高等師範學院	49
第六章 西蒙·德博娃	56
第七章 留學柏林	73
第八章 “女賓”奧爾加	80
第九章 《牆》和《噁心》	86
第十章 “奇怪的戰爭”	99
第十一章 《蒼蠅》	110
第十二章 《存在與虛無》	117
第十三章 《現代》雜誌創辦前後	133
第十四章 《自由之路》	146
第十五章 《骯髒的手》	157
第十六章 《魔鬼與上帝》	166
第十七章 做共產主義的“同路人”	173
第十八章 從“匈牙利事件”到《辯證理性批判》	189



第十九章	在“歐洲作家聯盟”的活動	200
第二十章	反對越南戰爭	209
第二十一章	與結構主義的論戰	220
第二十二章	支持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	228
第二十三章	從研究福樓拜到《造反有理》	242
第二十四章	絕望和希望	255
附錄	薩特生平及著作年表	275

## 第一章 母親

敘述薩特的歷史，要從他父親的早逝談起。

薩特的父親讓·巴蒂斯特·薩特(Jean-Baptiste Sartre)，原是法國西南部佩里柯地區迪維葉鎮(Thiviers)一位鄉村醫生的長子。據薩特在一九六四年寫的自傳體小說《字句》(*Les Mots*)所描述，他父親有一對炯炯發光而不是純樸老實的眼睛，圓圓的頭頂光禿禿的，嘴邊長着兩撇鬍子。他喜歡航海，一心想投考海軍軍官學校，巡視和欣賞那無邊無際的大海。後來他果真當上了海軍軍官。一九〇四年，這位被交趾支那的戰爭狂熱而折磨致瘦的海軍青年軍官，在諾曼底半島北端的軍港瑟堡(Cherbourg)認識一位來自東部阿爾薩斯地區的漂亮姑娘安·瑪麗·斯威哲(Anne-Marie Schweitzer)。薩特在《字句》中是這樣敘述這件事的：

“他把這位孤單的、高個子的姑娘搞到手，娶了她，很快地生下一個孩子，就是我，但接着，他就在死亡中為自己找到了永遠安息之所。”

薩特的父親之死並不是平靜的。他得的是腸熱病，高燒時斷時續，拖了一段時間，給全家人增加了不少憂慮。安·瑪麗細心地照顧他，對他始終一片忠心。後來，奄奄一息的讓·巴蒂斯特被護送回老家，在離迪維葉鎮不遠的一所農舍中渡過他的短暫的餘生。薩特的祖父每天坐馬車從小鎮來看望他。薩特曾以充滿同情的筆調描述他父親臨死前的這段生活：

“許多無眠之夜和焦慮折磨着安·瑪麗，使她變得很憔悴，她

的奶乾了；人們把我放在離那裏不遠的地方撫養；我自己也差點被腸炎或懷喪送了命。我媽媽剛剛二十歲，既無經驗又沒有人指點，就被兩個陌生的垂死掙扎的人所折磨。她那基於利害關係的婚姻終於在疾病和喪事中找到了真理。但我還是從這種情況中得到了好處，因為在那個時候，母親總是要親自給孩子餵奶，而且餵得很久；如果不是托以上雙重苦難之福，我可能會處於一個緩慢形成的奴隸的苦難境況之中。疾病，生下九個月就被強行斷奶，發高燒以及由此引起的遲鈍化使我不能真正體會到那切斷母子聯繫的最後一着；我一頭栽入一個渾沌的世界中，一個充滿着單純的幻覺和粗野的偶像的世界。在我父親去世的時刻，安·瑪麗和我，兩個人都從一個共同的惡夢中甦醒過來。我的病是被治好了，但我們却成爲一種誤解的犧牲品：她以愛心重新找到一個她實際上從未離開過的兒子；而我却在這位女陌生人的膝上復甦過來。”（《字句》，法文版，Folio 出版社，第16至17頁）

薩特在《字句》一書中，先是用整整五頁的篇幅回顧他的家譜，一直上溯到上一世紀中葉。從這個家譜，人們看到，薩特把重點放在母親的系列；對於他父親的家系，他只是簡略地提到自己的祖父父母的家境：祖母是佩里柯地區一位趨於沒落的房產業主的女兒。當祖父在結婚之後發現祖母娘家是個破產戶的時候，他一怒之下竟在婚後四十年的漫長日子裏，始終不對自己的老婆講哪怕是一句溫柔話；就連在飯桌上，他也只是用手勢表達自己的意思。她死時，他只管她叫“我的房客”。

薩特對祖父的殘酷無情是不滿的。相反地，他對於外祖父一家却有深厚的感情。本書將在第二章集中地講述薩特在父親死後同母親移居外祖父家的情況。

薩特曾說：父親之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對他來說，父親之死不僅爲他帶來難忘、痛苦的童年，而且給他的精神狀況、性格、感情的成長和一生的前途都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

薩特是在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生於巴黎的。那時，他的家座落在巴黎十六區米涅阿德街（Rue Mignard）二號。

一九〇五年，不論對法國或對於全世界，都是極其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的法國通過了“關於教會與國家分離的法令”。由於這一法令，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四年，法國全國天主教所屬小學校的學生減少了三分之一，天主教中學則在同期內喪失了四分之一的學生。應該看到，薩特的小學生活，恰巧就是天主教會在教育領域內逐漸削弱其勢力的社會環境中渡過的。

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薩特出生的那一年，恰巧又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新危機的開端。資本主義經歷了自一七八九年法國偉大革命之後的一個多世紀，已經膨脹成爲畸形的龐然大物：帝國主義產生了。這一年，在東方，持續兩年的日俄戰爭剛剛以日本的勝利而告終，俄國的反對沙皇的民主革命就打響了推翻資本統治的第一炮。在法國國內，第三共和國面臨着嚴重的考驗。由孔布（Emile Combes, 1835—1921）所倡導的政教分離法令不但沒有加固激進黨（Parti Radical）的統治，反而導致孔布本人的下台。在這一年的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國際工人協會法國分部——法國共產黨的前身——誕生了。國際工人協會法國分部的成立同薩特的出生，偶然地發生在同一年內，這是意味深長的。我們將會在薩特的歷史中看到，他與法共的關係一直成爲一個重要的因素，不時影響着薩特的思想發展和生活節拍。

從世界文化發展的舞台來看，一九〇五年也是個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的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四十九歲，已經完成了他的精神分析學的體系化；他的學說開始衝出奧地利的國界，而成爲一支有世界影響的思想潮流。同一年，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已四十六歲。正是這兩位哲學家的思想成了未來的薩特哲學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爲了使讀者能從更廣的角度來觀察和分析薩特出生那一年的歷

史和文化背景，筆者願意通過比較同一年內法國國內外文化界名人的年齡，來勾劃出對薩特今後的思想發展產生直接影響的歷史人物的大致範圍——俄國革命文學家高爾基 (Maxim Gorki) 三十七歲；法國著名哲學家布倫史威克 (Leon Brunschvicg) 和作家吉特 (Andre Gide) 三十六歲；列寧三十五歲；法國作家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和瓦勒利 (Paul Valery) 三十四歲；俄國政治家托洛茨基 (Trotsky) 和美國科學家愛因斯坦二十六歲；畫家畢加索二十四歲；作家卡夫卡 (Franz Kafka) 和哲學家雅斯培 (Karl Jaspers) 二十二歲；法國哲學家巴斯拉爾德 (Gaston Bachelard) 和英國作家勞倫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二十一歲；哲學家馬塞爾 (Gabriel Marcel) 和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十六歲；意大利政治家格蘭西 (Antonio Gramsci) 十四歲；毛澤東十二歲；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埃呂阿德 (Eugène Grindel Eluard) 十歲；作家阿拉貢 (Aragon) 八歲；美國作家海明威六歲；法國心理學家拉康 (Jacques Lacan) 及作家馬爾羅 (André Malraux) 四歲。

所有這些比薩特大幾歲乃至大三十多歲的人，都可以說是薩特的同時代人。當薩特成年時，這些人都還活着；他們當中，有些人的思想直接地啓發了薩特，有些人則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同薩特直接交往着思想影響。但是，我們看到，這些人分屬於極其不同的文化範疇，具有不同的政治和哲學信仰，貫徹着不同的文學觀點和生活作風。他們的相互交流、爭論，乃至於鬥爭，恰巧為形成薩特的文化修養，產生極其複雜和深刻的影響。薩特本人的成長史，就是同這些在舞台上大顯身手的人物相互交往的歷史。因此，毫不奇怪，在薩特所吸收的文化養料中，就已經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這些人的創造和他們對前人的批判成果。這些人的存在，一方面為薩特提供了最好的時機，得以通過他們的多種文化成果，去接應人類歷史文化的豐富遺產；另一方面，也為薩特限定了條件，束縛着薩特的眼力和智力的發展，使他感受到現成框框的壓力，從而促使薩特決心衝

出這些人物的圈子，走自己創造的道路。薩特在寫自己的歷史時，對這些人物一貫採取既感恩又批判的態度。

薩特在一九五七年談到他的未來的傳記的時候，說：“在寫這個傳記的時候，對於單純地表現一個人生活的特殊性，我是不感興趣的。我要回溯的，是整個一代人的足以驚人的發展過程。我是出生在一九〇五年，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羣當中。我成長在這樣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的思想大師們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吉特和普魯斯特；這樣的時代，實際上，就是主觀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時代。……”

接着薩特在一九六四年又說：在自傳中，“我要表現的，是一個人怎樣從被視為神聖的文學中，過渡到一種行動之中——但這個行動仍然保持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行動。”

這就是說，當薩特出生的時候，整個法國和西歐的歷史發展實際上已經為薩特的成長設計了一個特定的、不以薩特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環境。這個環境是危機、戰爭、革命、浪漫、消沉、悲觀、無政府主義、混亂、創造、前進、陷入幻想之中、美的追求、惡的猖獗、生命的活力以及死亡的掙扎等等複雜因素交錯在一起而又相互影響的時代。對於薩特來說，最重要的，正如他自己一再重複強調的，他自己是不可避免地被置身於“一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中”。每當提到這一點時，薩特總是懷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自豪感的。他自豪，因為在他看來，這個時代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由馳騁的時代；一大批和薩特一樣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恰巧利用了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搏鬥，因而使他們倆都雙雙為自身的政治統治奔忙而無暇從事於精神創造的時機，佔領了文化藝術、哲學、科學的大部份領域。

薩特在談到他在其中出生和成長的時代時，常說：“最重要的，是偶然性。”（“L'essentiel, c'est la contingence”）。這就是說，某種事物，它之所以存在是毫無原因的；我之存在，是無從談

起的。“我就是存在；當我存在的時候，‘我的存在’已經是存在了。”因此，存在的本性就在於“偶然性”。正因為存在本身是毫無原因的，是完全偶然的，所以，薩特又乾脆說，存在實際上是一種虛無。他說：

“存在就是在那兒，在我們周圍，在我們之中；它就是我們；我們不能說出哪怕兩個字而不提到它，但，總而言之，我們又碰不到它。當我認為想到它時，必須相信我什麼都沒想，我有過的是空空的腦袋，或者說，恰巧只有一個詞在腦子裏，這就是‘存在’這個詞。”

這些基本思想，或勿寧說，這些在他成為哲學家後被大加論述的基本思想，在薩特本人看來，不是別的，乃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主觀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時代”的哲學產品。這些思想和薩特本人之存在，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產兒；但這個“產兒”之產生原因，按照薩特本人的理論，又是無從談起的。換句話說，它們之產生乃是偶然性，乃是機緣，又是虛無性。這個基本觀點，將貫穿於這本為薩特所寫的傳記中。現在提起這個觀點，還只是開端，讀者無須要求自己即刻瞭解它的深奧含義。只要堅持把這本傳記讀下去，自然就會悟出其中的某些或大部份的道理——而這些道理又恰巧是薩特的哲學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從這個基點出發，讓我們再回到薩特的悲慘的童年時代，回到他父親早逝的舊事上。

父親的早逝對薩特有着決定性影響，用薩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把他“拋到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境況中”。

家破人亡的威脅，迫使年青的寡婦——薩特的母親安·瑪麗抱着不到一歲的薩特，重回娘家。

薩特說：“我父親的沒頭沒腦的異常死去，得罪了斯威哲一家人，因為母親之回娘家很有點像被遺棄。由於事先既未能預知又不加防範，我媽媽成了不光彩的罪人：她昏頭昏腦的找到一個短命的

幼年薩特與其母



丈夫。”（《字句》，第2頁）

當然，安·瑪麗實際上是毫無罪過的。正如薩特所說，“她對我父親並不很瞭解，不管是婚前還是在婚後。”她在讓·巴蒂斯特死後，和她在婚前一樣，純樸、老實、溫馴。這位外省姑娘回娘家以後，迎接她的是兩位年老的、退休了的父母。她有自知之明：雖然旁人在表面上對她還是彬彬有禮的，但她很敏感地體察到別人對她的暗地責怪。爲了取得別人的寬恕，她寧願犧牲自己，天天勤勤懇懇地工作，操勞家務。

當時，外祖父母的家已搬到巴黎西南郊的默東（Meudon），在那裏一直住到一九一一年爲止。薩特的童年就是在這裏渡過的。六年間，安·瑪麗實際上成了外祖父家的女傭人。打掃房子、上市場買東西、做飯、洗衣服，樣樣都做。但外祖父母却沒有給她工錢。不僅如此，外祖母還以家庭主婦自居，總要在女兒面前顯示她的威



風。正如薩特所說：“這位年老而又不顧常理的女人只有一個幻想：她自以為是不可缺少的。可憐的安·瑪麗，真是左也不行，右也不行：被動消極的話，人家就責備她是一個累贅；主動肯幹的話，人家就懷疑她要操縱管家權。爲了避免第一個罪名，她需要鼓起一切勇氣；而要避免第二個罪名，她需要保持謙遜。”她的衣服、裙子磨破了，但外祖母從來沒想到要給她換新的。

安·瑪麗被禁錮在家裏，被禁止單獨外出。如果她的老朋友邀請她吃飯，她必須事先請假，並保證要在晚上十點以前回家。這樣一來，每當安·瑪麗被邀請外出吃飯時，主人總要在十點以前趕她回家。而這個時候，正如薩特所記載的，外祖母早已不耐煩地在家裏拿着錶踱來踱去，並不時地咆哮如雷，或嘟囔不停。

如果說，讓·巴蒂斯特之死“使母親重新被套上枷鎖”的話，那末，對薩特來說，恰巧相反——父親之死使他“享受到沒有父權壓迫的自由生活。”（見《字句》）薩特在提到這件事時，強調說：“天下沒有慈父，這是規律。人們並不是因此而責備男人，而是指那腐朽了的父權制。生子女，再好沒有；撫養他們，就去他媽的！假定我父親活着，他就會盡其所欲地躺在我身上並把我壓碎。幸好，他死得早，使我在身受壓迫的同伴當中，能夠獨自自由自在地到處遊蕩着，……由於我把一個年紀輕輕就死去的那位男人甩掉，使他來不及做我的父親，……。這件事究竟是好還是壞呢？我不知道。但我由此而衷心地同意一位傑出的精神分析學家的意見：我沒有‘超我’。”（見《字句》第19頁）

按照佛洛伊德的理論，“超我”不僅是人們心理深處的潛意識的壓迫者，也是人們“自我”意識的支配者。“超我”實際上是自我以外的我在權威在人的意識中的化身，它總要高踞於“自我”和潛意識之上施展它的統治權威。薩特在講到他的童年時，經常強調他父親早死這一事實，對他的精神狀況及其發展的影響。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薩特自小就嚮往自由，厭恨一切形式的壓迫，不願服從